

论邓小平外交思想对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的指导意义

李 文 沈予加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有学者认为中国需要调整邓小平提出的“不结盟、不干涉内政、不当头”的“三不原则”,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本文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拥有五千年历史与文明的国家,在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过程中,应继续以邓小平有关“不当头”的思想为基本遵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把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当作最大的机遇,结伴而不结盟,在不干涉内政、尊重国家主权与平等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

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思想;新型国际关系;大国外交

为了实现在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邓小平主张将“睦邻友好”作为中国的“周边政策”,将创造一个良好地区环境作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安全维护的辅助。^①因此,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对外关系的方针原则,其核心是“不结盟、不干涉内政、不当头”。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面临的国际矛盾日益复杂与深刻,一些学者开始认为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三不原则”已无法满足中国外交的需要,取而代之的应是更为强硬和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例如,以阎学通和辜学武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应该适时改变“韬光养晦”的政策,通过联盟制衡、对别国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等手段应对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并维护中国不断增加的海外利益的诉求。这些观点的代表著作和论文有《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②、《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中国崛起势不可挡》^③、《中国外交需要“韬光养晦 2.0”》^④、《中国“后韬光养晦”外交引人瞩目》^⑤、《“韬光养晦”还是少提为妙》^⑥,等等。

在 2014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

① Suisheng Zhao, “The Making of China’s Periphery Policy”, in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New York: M. E. Sharpe, 2004, p. 257.

② 参见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 年版。

③ 阎学通:《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经济周刊》,2013 年 11 月 12 日。

④ 辜学武:《中国外交需要“韬光养晦 2.0”》,《南风窗》,2013 年 2 月 4 日。

⑤ 陈有为:《中国“后韬光养晦”外交引人瞩目》,联合早报网,2010 年 12 月 21 日。<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chen-you-wei/story20101221~55887>,2015 年 3 月 28 日。

⑥ 李因才:《“韬光养晦”还是少提为妙》,《联合早报》,2010 年 1 月 1 日。

际关系。^①这一倡议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拥有五千年历史与文明的国家,在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大国外交道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体系过程中,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依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最大的机遇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

1990年12月,邓小平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②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即二十八字方针成为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原则。

今日中国在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过程中,我们应当继续以邓小平有关“不当头”的思想为基本遵循。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中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鉴于这一判断,习近平得出结论“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③

第二,当头往往需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例如,美国长期以来始终信奉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模式和发展路径,认为适用于本国的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④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使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自认为有义务,也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但历史已经证明,直接引入西方制度并不能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水土不服的政治制度反倒是导致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紧张、失序和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美国有所不同,中国的发展理念与价值承认并尊重世界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认为适合自己国家的制度和价值不一定同样适合世界其他国家。与美国奉行霸权主义、力图改变世界的做法不同,中国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治理法治化,不诱导或强迫别国屈服于自己的意志,主张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异同,最大限度地谋求共同利益。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

^①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4-11/29/c_1113457723.htm,2015年3月28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4-11/29/c_1113457723.htm,2015年3月28日。

^④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编者絮语,第2页,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习近平谈到：“正如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①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以挑战和颠覆现有国际秩序为前提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确，“中国主张对国际秩序和体系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不是推倒重来，也非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②既通过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实现自身进步，又通过向世界全面阐释互利共赢外交理念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应有之意，而当头意味着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使中美关系易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③。

第四，当前中国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正确的战略选择应是继续高扬“和平、和睦、和谐”的旗帜，与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最大限度地继续为自身发展争取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2010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的高速发展威胁到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既存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并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价值观构成挑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坚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外交模式，企图重燃冷战思维，将中国视为其国际霸权地位的颠覆者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号对手。为了在战略上遏制中国的崛起，近些年来，一方面，美国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另一方面，又“重返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传统同盟体系，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在中国周边挑拨是非、生乱生事。美国这种强力介入亚太国家间事务的做法，突显了亚太地区不同国家之间政治社会制度的差异，加剧了他们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对亚洲国家领土主权纠纷的加剧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升级等也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种局势下，中国更应该继续保持足够的理性、克制与耐心。中国如果与美国争高下，谋取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必然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当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的既得利益造成冲击，从而加剧中美之间的矛盾、对立与冲突，并很可能再次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两国既非单纯的对手，亦非单纯的伙伴，双边关系中基本的竞争、对立、协调和合作成分既有相对的稳定性质，又有一定的变动特征；两国之间除了对抗之外，还存在可以争取的多种变数与可能。“中美两国都必须明白，任何非同小可的彼此间轻视，任何左右相关国策的误解或偏见，任何就对方的紧要利益、实际能力和基本情感做出的严重误判，往往都会导致重大的损失和深远的后患；无论是试图以实力胁迫对方屈服的蛮横做法，还是出于激愤和莽撞的过激反应，都可谓政治上的浅薄和战略上的轻浮。”^④

第五，不“当头”，不等于在国际社会无所作为。十八大报告明确宣示：中国将“以更加积极

① 《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新华网，2013年3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03/20/c_132247752.htm，2015年3月28日。

② 《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新华网，2015年3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5-03/08/c_1114562940_2.htm，2015年3月28日。

③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该词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④ 时殷弘：《当前中美日关系的战略形势和任务——一种宏观视野的讨论》，《日本学刊》，2015年第1期。

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①。近年来,中国据理力争,积极主动地应对来自美国的各种压力与挑战,谋取与美国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目的就在于争取与自己的综合国力相一致的国际地位。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正在对国际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如共同应对全球问题、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地区的维和行动、在上海合作组织中起到表率作用、成功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由于对中国的发展现状把握准确,对外政策成果显著,中国正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和平崛起,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也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崭新的发展模式。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的,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②

二、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交往对“结盟对抗”秉持肯定或不明确否定的立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曾一度与苏联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后又主张与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对抗美苏霸权,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还与美国“准结盟”反对苏联。改革开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84年5月,邓小平在概括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③,即不结盟、不孤立、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全方位进行外交活动,其核心是不结盟。1988年12月,邓小平指出,“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④本文认为,中国在今后的外交实践中,坚持在不结盟的前提下广交朋友,既符合自身的外交理念,也有利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强权政治日益不得人心,一国的影响力固然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有关,但所持的外交理念是否符合公平正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任何国家,只有坚持不结盟,才能秉持公道正义,积极参与制定和维护国际公约和规则,参与主导国际秩序的重建,主张在国际规则面前平等,就事论事,不以国划线,而是以线划国;不但讲利益,更要论是非,才能真正坚持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展现博大的胸襟,高扬公平、正义、平等的旗帜,主张按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判断和处理国际事务,不搞远近亲疏,拉帮结派,才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正如习近平再三强调的:“要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里。”^⑤超越冷战思维,摒弃霸权主义,是历史赋予中国的使命,也是发展机遇的真正所在。

第一,不结盟为中国真正推进合作与和平提供了条件与可能。联盟对抗的思维将国家间关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第48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② 格雷厄姆·艾利森等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第5页,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
④ 《在会见日本国际贸促会访华团时邓小平倡议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希望新秩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超级大国和地区性的霸权主义及集团政治非约束不可》,《人民日报》,1988年12月3日。
⑤ 习近平:《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脑袋还停留旧时代》,新华网,2014年05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26528334.htm,2015年3月28日。

系界定为“非此即彼,不赢即输”,强调对立与对抗,其实质是要拉拢一部分国家,孤立一部分国家。不结盟,则意味着“不孤立、不对抗”,“共建、共享、共赢”。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朋友多了路才好走,我们应该通过坦诚深入沟通、增信释疑,应该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坚持互利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共同发展,应该变赢者通吃为各方共赢,共同做大亚洲发展的蛋糕,共同促进亚太大繁荣。”^①

第二,联盟对抗有悖于中国有史以来形成的和平理念,也不符合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政治主张。以征服与侵占为目的的阵营观是一种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陈旧理念,遵循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逻辑: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分化组合,主要是以结盟来完成的。由于结盟几乎无一例外地要针对第三方,从而很容易将国际关系带入分裂对抗的冲突逻辑中。”^②中华民族自古爱好和平,正如习近平所说:“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③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比较世界各种文明的发展后指出,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从来没有对其疆域以外表示过帝国主义野心,传统上就是一个大而不霸的国家。“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④与资本主义固有的强盗哲学有所不同,社会主义主张大小国家有着平等的国际地位,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与压迫;秉持公道、捍卫公理、伸张正义,推动国际关系的公正和民主,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政治。

第三,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压力也没有达到“不结盟不行”的程度。目前中国在外交方面遇到的最严峻的考验主要来自美国及其在亚太的盟国,但事态远远没有严重到非得与美国摊牌不可的地步。尽管美国为了遏制中国,高调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怂恿和支持少数国家寻衅闹事,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朝向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的趋势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和平、合作与和谐一直是亚洲发展的主旋律;追求稳定、和平与国家的国家是多数,刻意制造对立、对抗和冲突的国家依旧是少数。

对周边安全环境的正确判断应来自对周边国家与中国关系现状的具体分析。如果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分为“可意、可以、可忍、不可忍”四组,属于第一组的国家至少有巴基斯坦、柬埔寨、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斯里兰卡等国。属于第三组,即可忍的,有日本、越南和菲律宾。其他大部分国家都属于第二组。应该说,中国与日本、越南和菲律宾三国的关系并没有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其理由在于至今中国与上述三国仍保留外交关系和经贸往来,中日之间在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依旧存续,2008年两国还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越之间官方的说法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菲之间则存在战略合作关系。

第四,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日国际关系格局的性质与面貌。中美关系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即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

① 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人民网,2014年11月11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1111/c1004-26004326.html>,2015年3月18日。

② 苏长和:《结伴不结盟》,《解放日报》,2013年10月15日。

③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人民网,2014年3月28日, <http://www.zgdsw.org.cn/n/2014/0331/c218988-24780294.html>,2015年3月18日。

④ 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9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强中弱的情况下,合适的战略是强调合作而非对抗。中美合作是必选项,而不是可选项。中美两国合作,双方都能从中获得利益;如果中美关系破裂,走上冲突与对抗,必然导致整个人类社会都难以承受的灾难性后果。

即使中国有意用结盟的方式对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在目前情况下也缺乏可行性。因为在今日亚太地区,与中国结盟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与美国为敌,因此,鲜有国家愿意联合中国与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对抗。在中美关系日趋复杂化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应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处境,尽量不要把其他国家拉入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尴尬境地。

第五,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曾试图把国家“建设”成反帝反修的强大的世界革命根据地。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宣布:“世界已经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革命新时代”,“世界的革命中心”,“逐步转到了中国”。但即使是在当时,中国也没有具备一呼百应的能力。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坚持“不结盟”原则不等于消极应对世界变革。首先,不结盟外交不等于等距离外交。目前中国外交的特点是全面而有重点,即构筑全方位外交;同时,在全方位外交中又重点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强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重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其次,不结盟不等于不交朋友,不搞合作。近年来,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是注重构建伙伴关系,走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201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了坚持以不结盟为前提,广交朋友,构建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的外交基本思路。^①自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首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与中国建立不同形式、不同程度伙伴关系的国家有67个、区域组织5个,共建立了72对伙伴关系,已基本涵盖了世界主要国家和重要地区。在2014年的密集出访中,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又将多对伙伴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积极提倡与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共同建立新的安全框架。2014年11月11日,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领导人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推动制定亚太自贸区路线图,称实施该路线图将促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将对保障亚太地区稳定和繁荣做出实质性贡献。

为切实加强国际合作,习近平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成为新形势下我国推进对外合作的总体构想。“一带一路”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得到沿线近60个国家的积极响应,为欧亚大陆的振兴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②

在外交实践中,中国不以是敌是友论是非,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结束了对某些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国家无条件地加以支持、“要什么给什么”的历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不干涉内政”成为中国外交中重要原则之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政

^① 参见王毅:《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特色》,新华网,2014年12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2/24/c_1113763159.htm,2015年3月28日。

^② 参见王毅:《指导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强大思想武器——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人民日报》,2015年2月12日。

府更加明确地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将实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1990年7月,邓小平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①

改革开放以来,“不干涉内政”原则为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出发,中国当前仍应坚持将“不干涉内政”作为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基本准则。

第一,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是维护世界和平基本要求。《联合国宪章》在第一章第二条中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②如果国家之间做不到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强权政治就会大行其道。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依仗“一超独霸”的军事实力,主张“有限主权论”和新的“主权过时论”。为了避免公然入侵主权国家、干预别国内政、推翻他国合法政府受到国际舆论谴责和国际司法审判,1999年科索沃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创造了所谓的“新干涉主义”。“新干涉主义”假借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共同价值观为名,通过武力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其目的是建立霸权主义和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秩序,其两大理论支点是“人权高于主权论”和“普世价值论”。^③根据“新干涉主义”的外交理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择手段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的价值和社会制度,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使许多地区和国家深陷动荡、冲突,甚至战争之中。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新干涉主义”。

第二,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价值观念提倡“以和为贵”、“多元共存”,主张“和而不同”。冷战时期,作为国际政治两极的美国和苏联信奉具有普世意义的政治模式和发展路径,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适用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冷战结束后,美国最终取得了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霸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价值观念和文化领域的发言权。美国不断尝试将自身的价值理念和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的做法,正是造成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紧张、失序和混乱的根源。

中国的发展理念主张“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方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④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同年12月,习近平再次强调:“我们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⑤

第三,干涉他国内政与中国宣示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相悖。干涉他国内政是殖民主义和霸权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9~360页。

② 《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官方网站:<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2015年3月18日。

③ 夏安凌:《西方新干涉主义》,第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④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新华网,2013年3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5/c_124501703.htm,2015年3月28日。

⑤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3年12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6/c_118723453.htm,2015年3月28日。

主义的一贯做法。社会主义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调和平发展,提倡“亲、诚、惠、容”,要打破“国强必霸”的定律,做一个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的新型大国,强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干涉内政是验证上述宣示的试金石,也是中国需着力创建并维护的品牌形象。

面对中国正在接近成为世界强国这一目标的客观现实,许多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感到担心、疑虑,甚至忧虑,这是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复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中国以怎样的理由干涉别国内政,都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方面,中国依旧属于发展中国家,而对别国内政进行干涉需要付出巨额成本;另一方面,干涉别国内政必然直接恶化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不仅客观上给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遏制与进行攻击提供了口实,而且会增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地区国家的担心与疑虑,将中国置于腹背受敌的境况。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不干涉内政这一原则,在中国外交实践中不断得到贯彻与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近年来,尽管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内政明显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但中国始终保持了足够的克制和耐心,对其政权的变更没有施加任何干预与影响。其二,发达国家的国际援助普遍带有政治、战略目的,或附加各种条件,包括传统的排他性条款和诸如“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等专门条款。近年来中国一如既往地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支持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但中国的援助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对每个国家的道路选择予以充分尊重与支持。在2013年3月访问非洲时,习近平指出:中方将不折不扣落实援非承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重在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①其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其核心内容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基本理念是合作共赢,注重在涉及双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的彼此支持。2014年8月,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演讲时说,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②这一表述,充分展示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责任担当。

作者: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市,100007)

沈予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市,102488)

(责任编辑:刘杰)

① 习近平:《现代化的中国不忘患难之交》,《人民日报》,2013年3月25日。

② 习近平:《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新华网,2014年8月2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8/22/c_126905369.htm, 2015年3月18日。